愤怒的台湾

苏 新

武装抗日运动

（自 1895 年至 1915 年）

（一）清朝割让台湾的经过

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，欧美帝国主义者相继侵略中国，正当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无法应付这些侵略者之时，东邻小国日本，乃乘火打劫，展开蚕食政策，藉朝鲜独立问题干涉清廷，进而开启战端，这就是 1894 年的所谓“甲午之役”。战争的结果是，新兴资本主义日本竟战胜了“老大帝国”的清军，缔结《马关条约》，清廷把台湾割让给日本。

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及外相陆奥宗光签订《马关条约》之后，自知丧权辱国，无颜以对国人，乃于还天津之后，称病不敢入都，只派伍廷芳携带条约至京。因在他未去谈判时，对于朝中与日本议割台湾，朝野已一致愤激，台湾方面的官民，抗击尤为激烈；及《马关条约》发表，国内外官民，更上奏拒绝批准，不下数百起。当时康有为等数千人上书，文辞激烈悲壮，使清廷亦为之愧悔，下令李鸿章改议。但李以为，既然以全权签约，如加更改，将贻笑万邦，坚决不从。

反对派的活动毫无结果，列强尤其英美又多偏袒日本（俄、德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法曾极力阻挡，但毫无效果，此亦为日俄战争之远因），清廷乃命伍廷芳为“换约使”，赴烟台换约。日本换约使伊东已代治也至烟台，于 1895年 5月 8 日夜间换约。至 5 月 18 日，清廷命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“割台湾使”，日本即以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，在基隆口外日舰上，进行奇耻大辱的台湾授受勾当。

（二）台湾人民的独立抗战与“台湾民主国”的成立

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悲愤反对，台湾居民尤痛哭呼号，起义反抗。台湾巡抚唐景崧，闻《马关条约》中已将台湾割与日本，立即致电总理衙门，乞在华外国公使支援，并求英国出而主持公义，及求法国派兵来援，以反抗日本，但均无所成，始知帝国主义者原为一丘之貉，不足以倚，乃决心独立抵抗。

是时绅士丘逢甲亦率领人民谒巡抚唐景崧，提议台湾实行独立自主，反抗日本侵略。唐氏乃与台湾防务帮办刘永福相谋，成立“台湾民主国”，改年号为“永清”，推唐景崧为总统，发表抗日宣言，并推举丘逢甲为副总统兼义军总领，派姚文栋为游说使，赴北京报告建国真相，并与国内反对和议割台之大员，如张之洞等及中央军机处官员，暗相联络，以便获得国内支援。

但日寇为实现其占领台湾的野心，不惜出动大兵，以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为司令，率领近卫师团大举侵台。由台湾东北角澳底登陆，越三貂岭，攻陷基隆。台北地方的民众，仍不断地和日军进行战斗，展开激烈的游击战。

在这时候，台北浪人辜显荣前往基隆，引导日军攻台北。丘逢甲闻讯，急调台中义军驰援，但行至中途，台北已被攻陷了。台

南人民在唐景崧出走及台北陷入敌人手里的情况下，公举刘永福为抗日统帅。

日军得台北后，一面侵宜兰，一面攻新竹。丘逢甲率领义军（民军）在新竹一带与日军大战。新竹、嘉义、彰化等地之会战激烈空前，一说日寇能久亲王实于嘉义之役阵亡，日人秘而不宣，却说在台南病死。嘉义陷后，终因饷缺粮绝，孤立无援，义军统领丘逢甲亦不得不离台。

在台南方面，即由刘永福领导，继续团结散军，结合全岛富绅，召集义民，募集军饷，征募抗丁，训练抗日民军，以黑旗为徽号，因此有“黑旗军”之名，声势仍极浩大，坚持保卫台湾，反抗日军到底。

其时日本大本营，则制定三面进攻计划：在台北编成“南进军”，派能久亲王率近卫师团，由彰化经嘉义向台南；派乃木中将率第二师团，由南部枋寮登陆，经凤山侵台南；又派贞爱亲王率混成旅团，在西部布袋嘴登陆，犯台南前方侧面，围攻台南。但遭遇意外顽强的抵抗，缺乏新式武器与训练的台南抗日军，到处对日军加以阻击，经过一个月的血战，日军攻入台南城。抗日统帅刘永福，不顾日军一切诱惑，坚持抵抗。及大势已去，乃赴安平，率残部返大陆。而日军最高统帅能久亲王，一说也于此役阵亡。

日军攻占台南后，于 11 月下旬始公布“全台平定”。

据日方事后发表，侵占台湾之役，参加兵力约 5 万人，伕子约 2.5 万人，马 9400 余匹。战死和病死者 5000 余人，因病送返日本者约 2.5 万人，留于台湾治病者 5000 余人，总计损失达 3.5 万余人，即出征者的半数以上。但台湾人民被杀死者，据不完全的估计（当时事实上是无法统计），达数十万，可见日寇征台时的残忍，以及台湾人民牺牲之大！

（三）初期的武装抗日运动

南部抗日义军惨败之后，日军宣布台湾“全岛平定”。当然这是对外的宣传，实际上台湾各地，还不断地发生抗日游击战，成为日据时代台湾人民初期的民族运动的形式。而日方则重演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故伎，称之为“匪乱”。

日本宣布“全岛平定”的日子是 1895 年 11 月，但是 12 月 30 日就发生了林大北领导的抗日暴动，在北部发动，包围了宜兰县。第二年，1896 年 1 月，又有陈秋菊、胡阿锦等所领导的抗日暴动，袭击台北。此时深坑、士林、沪尾、枋桥（今之板桥）、锡口（今之松山）、瑞芳、金包里（今金山）、海山口、罗东等处，没有一处不起来响应，袭击官衙，占领村庄，包围及袭击城市。 1896 年 5 月，清军中的猛将刘德杓率部由卑南入云林山中，散发檄文，反对割让台湾，号召台湾人民起来反抗日本统治者，一时附近居民，纷纷响应，形成台湾中部一大抗日势力。 6 月 30 日，太平顶义士简义率领部众，大举进袭云林。此外林圯埔（今南投竹山）、南投、台中、彰化、北斗、他里雾（今云林斗南）、鹿港、员林、莿桐巷（包括今云林县莿桐、甘厝、甘西、兴桐等村）、大埔林（今嘉义大林）等地，亦纷纷响应，起来反抗日军的统治。 7 月 10 日，义士黄国镇、阮振等大举包围嘉义，建立台湾中南部抗日根据地。

日寇对于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战，显得手忙脚乱。他们首先“讨伐”斗六、南投方面的抗日势力，镇压了简义。但同年 11 月 19 日，民众领袖柯铁又与刘德杓部会合，而郑吉生部于同一天猛袭凤山。日军于 12 月 27 日，以第二旅团攻太平顶山区的柯铁所部，但毫无结果，而各地的抗日暴动并不因日军的血洗而消极。

1897 年的台湾，全岛还是在骚动中，武装抗日斗争几乎没有

一天停止过。南部方面：是年 11 月 23 日，抗日领袖黄茂松等，袭击了朴子脚（今朴子）日本所设“支厅”。北部方面：于同年 5 月 8 日（即日本正式割台湾入日本版图的纪念日），陈秋菊所部又大举袭击台北，不幸失败，先锋部自领袖詹振以下，同时惨遭最残酷的仇杀，日方公报只承认杀死“匪贼” 200 余人，但是实际何止十倍！

（四）日寇的“抚剿政策”

为了镇压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运动，日寇最初是采取警察、宪兵、军队三者合作的“讨伐”，用惨无人道的杀戮、最恐怖的手段，以图压服暴动，维持统治。但台湾人民对日寇的仇恨，却更深了。于是日寇一改过去的武力万能的一味“讨伐”，而新采用所谓“土匪招降”的做法，各地领袖被诱降之后，日寇就实行对他们部属的分解、监禁和杀戮，到其部属全面被消灭之后，再将被诱降的领袖加以处死。因此，这种“招降政策”，只能实施于北部，至于南部的领袖，鉴于北部抗日部队的覆辙，他们不但对日方的引诱置之不理，而且继续反抗。又由于日寇的苛捐杂税，激起了台湾人民普遍的反感，台湾的抗日斗争，没有因“招降政策”而消沉，其势力反而日益壮大。

1898 年 7 月，高乞集结义民占领横山，又与林添丁所部联合袭击店仔口（今台南白河）日本办务署，这是南台北路的情形。南台的南路，抗日势力更盛，据日方报道，在林少猫、林添福等领导之下，亦有武装人员 3000 余。同年年底，大举袭击各州厅日本办务署。12 月 19 日，下淡水溪地方的抗日部队攻入恒春，与高山族 700 余人联合，袭击日本办务署，占领日本各机关，历时十余日，至 31 日始退出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日本的诱降政策，在南部完全失败，因此日寇不得不再实施恐怖的“讨伐”和血腥的屠杀政策，对于凡曾有抗日分子存在的村庄，不分皂白，一律焚杀。1899年1月，日军以大队猛攻云林，并且利用清朝方面的奸细，诱捕该地抗日领袖刘德杓，移交清廷，才算一时压下了云林方面的抗日势力。

从此以后，日寇就开始进行无情的“血的扫荡”。1899年3月，大坪顶（今高雄小港、坪顶、大坪等地）地方的柯铁、后大埔（今嘉义大埔）的黄国镇、冻仔脚的林添丁等人被围困，不得已由领袖个别出降。同年4月，十八重溪的阮振， 5月12日,南路的林少猫，被攻亦暂时“归顺”。同年12月，拒绝诱降的高乞、魏开、卢石头等部，受到日军第三旅团的围剿； 1900年5月1日假降的云林柯铁所部又起反抗，终因遭到日军第三师团的扫荡而被消灭。

20世纪一开始，1901年2月，詹阿瑞领导发动了对台中日寇的大举进攻，同年11月23日，嘉义的黄茂松等亦发动对朴仔脚日本办务署的攻击，揭开了20世纪台湾抗日斗争的第一页。

这样，台湾中南部的抗日民众，在日军“血的扫荡”，众寡悬殊的形势之下，坚持作战十个多月，至是年12月，放弄山抗日根据地被攻陷，黄茂松等40余领袖惨遭杀害。第二年三四月，黄国镇、林添丁先后被捕，均于当日因不屈而被杀。是年4月15日，仍秘密进行抗战的阮振，在店仔口一役，壮烈牺牲。 1902年5月25日，张大猷等360余人假投降，在这一天日方特别举行“归顺典礼”时，突然起而暴动，杀死了日方许多重要官吏及将领，最后因寡不敌众而全部被害。

（五）林少猫事件

林少猫是台湾南部的社会领袖，他在凤山、阿猴（今之屏东）、潮州、阿里港（今屏东里港）、东港、下淡水溪各地，有极大的潜势力。他与台南的林天福和吴万兴等，互通声气，以义相结，不甘受日寇的奴役。1898 年 12 月,他们即曾联合起来,以千余人出击潮州日本办务署，杀死办务署长濑户等，一时台南方面的日寇，亦因而恐慌逃避。是时的总督儿玉源太郎也只好宣布招抚，不惜尽其诱惑之能事，使林少猫等误中其计，并遭日寇枪杀。事后，日寇又在后壁林惨杀林氏家属及亲友，共男子 107 人，女子 31人，幼童 15 人。捕获后杀死的男子 31 人，女子 22 人，小儿 25 人。其惨无人道，已可想见，何况这种报告上的数目，不知已打了多少折扣呢！林少猫之外，其他民族领袖吴万兴、林天福等亦一齐被杀。

据日方文件公布：自 1897 年至 1902 年，台湾抗战志士被捕者 8030人，其中被杀者 3473人，而在战争中被焚杀活埋者，更不知凡几。这种台湾人民为国牺牲的精神，真是中华民族最优秀传统的表现！

（六）武装抗日的末期

由于日寇之暴虐无道，奸诈虚伪，实行“先抚而后剿”的政策，台湾各地的抗日暴动，相继失败了，而以 1902 年林少猫事件为最后，台湾的抗日斗争，也就逐渐衰退下去。

1902 年至 1907 年，这四五年间，表面上台湾人民像是“归顺”了日本帝国主义，但是，台湾人民对日寇的仇恨心，是有增

无减，他们随时都准备着去奋斗牺牲。自 1907年至 1915 年，这八九年间，此伏彼起，发生了下面几次大规模的抗日斗争：

北埔事件　1907 年 11 月 14 日，新竹应月眉庄蔡清淋领导民众掀起抗日暴动，攻占北埔支厅，捕杀日本支厅长，各官署长官、警察等 18 人，日官家属 22 人，及其他在地方虐待人民的日本人 15 名。进而南下，直扑新竹。后来在日方台北守备队、警察队合攻之下，始被镇压下去。

林圯埔事件　日本大财阀三菱，在日当局庇护之下，侵占民间竹林，大举采伐，引起人民的极度反感。于是志士刘乾，号召人民起而抗日，于 1912 年 3 月 23 日，进袭林圯埔支厅（今之竹山）顶林庄警察官派出所，杀死日本警官。南投厅即动员大批军警，向山林攻击，交战 7 日，结果起义者寡不敌众，多人被杀，12 人被捕，后皆被处死刑。

土库起义　林圯埔事件后仅三个月，又有嘉义应打猫（今民雄）地方的农民林朝等，传播祖国反清革命已告成功的消息，号召乡民响应，以驱逐日寇。于 6 月 27 日为日方发觉，大举搜捕，发生巷战。林氏等多人被害。

苗栗事件　祖国反清革命对台湾的影响日益普及，时有新竹厅苗栗牛桐庄人罗福星发动全岛抗日运动。罗氏曾任新加坡华侨学校校长，富有革命意识，辛亥革命时，亦参加过革命军。于 1912 年渡台，在苗栗地方组织革命同盟会、新民会等，不幸在推进革命组织中，在淡水方面为日方所捕。经过长期的搜查检举，被捕革命同志达 1211 人，于 1914 年 11 月至 12 月，在日寇苗栗临时法院受审，结果被判死刑者 221 人，有期徒刑者 285 人。

这一次事件，对日寇的直接打击，虽因事泄而不大，但是在开始以有组织的力量反抗日寇这一点上，有很大的意义，而且在提高台湾人民的民族革命意识方面，亦存很大的影响。

（七）西来庵事件

西来庵事件的领袖余清芳，屏东人，曾任台南厅凤山县的警员，因目睹日人暴政，愤然辞职，常怀驱逐日人、光复台湾之心。他辞职后，于 1915 年，迁居于台南县后乡庄，邻近噍吧哖（今玉井），见噍吧哖人受日人压迫，不堪坐视，乃决心起事。

余清芳与该县竹头崎（今嘉义竹崎）庄区长江定有交，他们俩又招嘉义厅他里雾人罗俊、台南厅参事苏有志、大潭庄区长郑利记等，密谋结盟抗日举义。1915 年 2 月，余清芳与江定拟定起义计划，罗俊亦参加，由三人名义向各地“菜堂”（斋教）活动，劝勉各信徒一致奋起，与台南西来庵的董事合作，发动台湾民众。同年 4 月，利用西来庵的改筑和祭事，集合资金，广募志士，参加抗日。一时台北、台中、南投、嘉义、阿猴（今屏东）各厅属各县居民，尤其是台南阿猴两厅交界的山地人民，纷纷参加，势力发展甚速，但为日寇所侦悉，在台南、嘉义、台中方面开始大规模的搜查。罗俊在竹头崎山中就捕，于是余清芳、江定知事已急，仓促集合同志千余人，祭旗兴师。7 月 9 日拂晓,突袭甲仙埔支厅，另派别动队袭击小张犁、大坵园、阿里关、十张犁等警察派出所，杀日警及其家属 30 余人。8 月 2 日又袭南庄警察派出所，杀日人 20 余人。乘势于 5 日及 6 日，布下 1000 余人，攻噍吧哖市街，占据噍吧哖支厅东北 1800 公尺处标高 593 尺之高地虎头山，包围噍吧哖，与日本台南守备队及警察队交战。日方恃其强大的武力，日夜轰击，连战 7 昼夜。抗日军因训练未精，武器又旧，到底不能支持，山寨遂被日军炮兵攻破，乃乘夜退入山中。此时仅剩 300 余人，攀山过岭，风餐露宿，连跑十多天，奔到四社寮山中，但疲乏冻馁，疫病交侵，余清芳也病卧草中，加之日方

搜查甚紧，至 22 日余氏在王来庄被捕。日人至翌年 5 月 18 日采取欺骗方法，将江定诱出后予以逮捕，这事件始告一段落。

据日方公报：是役交战而死者 159 人，因抵抗而被击毙者 158 人。被捕者 1413 人。

但日寇对这次抗战，抱恨太深，于 1915 年 5 月，在台南开了临时法院，至 8 月 25 日，举行第一审公判，乃大泄毒手，发挥残暴，自 9 月 6 日至 11 月 1 日，不到两个月间，领袖以下惨被执行死刑者 95 人，而同判死刑的达 866 人之多，于同年 11 月 10 日，因大正天皇即位而改处以终身监禁，然而至 1916 年 7 月 2 日，江定等 37 人，又遭屠杀，另有 22 名志士被判 15 年苦刑，两人被判 9 年苦刑。

不但如此，日寇竟将噍吧哖附近之后厝、竹园、番仔厝、新化、内庄、左镇、茶寮等 20 多个村庄住民，全部看作凶犯，制造了世界审判史上空前的大惨案。即囚集民众 3200 余人于一山坡，另择一大平地为刑场，以 100 人为一次，依次屠杀，除妇女外，不分老幼，皆就缚俯卧，老者龙钟佝偻，幼者就乳褓褓，无一幸免，实世界未曾有之浩劫。杀尸盈野，血流成河，且任其日晒雨淋，臭气薰天，凄惨之极，诚不堪设想了。

（八）武装抗日运动的经验与教训

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运动，至西来庵事件而告结束，每一次暴动都在日寇大规模流血恐怖的镇压下，完全失败了。抗日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：

一、缺乏健全的中央领导者，缺乏一个革命的党。

二、起义暴动者未受充分的战术训练，无游击战组织能力。

三、各起义者虽前仆后继，但彼此缺乏联系。

四、没有抗日民族革命政治纲领，多以复仇意识动员群众，故团结不能坚固。

五、与祖国没有密切联系，而祖国各革命团体对台湾人的抗日运动，也缺乏指导与援助。

但是，坚持十年的抗日暴动，也有相当的成就：

一、抗日暴动用鲜血淋漓的事实，来反证日寇殖民政策和“怀柔政策”的欺骗性，提高了台湾人民抗日的民族自觉性。

二、爱国的起义领导者们开始由少数人的抗日暴动，进而展开深入群众的民族革命宣传与组织，其中尤其是苗栗事件及西来庵事件，虽然仍不乏利用迷信方式，但在联系群众这一点上，对于以后台湾民族革命运动，有了极大的影响作用。

三、台湾人民革命运动，从此以后开始与祖国的革命运动紧密联系起来。

民族革命运动

（自 1915 年至 1931 年）

（一）日寇的“怀柔政策”

如上面所说，日本初期统治台湾的政策是以暴力恐怖镇压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，再行使权力，掠夺土地，榨取资源，同时实现独占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野心。

虽然台湾人民的抗日武装一时被镇压下去了，但是由于土地的掠夺和苛捐杂税的加重，台湾人民对日寇的仇恨，越积越深，原本无组织的个别反抗，也逐渐转为有组织的反抗，对日寇的统治，都随时造成威胁，于是日寇也就不得不改变方式，而采用欺骗政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策。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日本乘机对中国及南洋扩张其侵略势力，以台湾为侵略基地，正需要利用台湾人。因此开始对台湾人采取“怀柔政策”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社会各方面，都采取了一种改良主义，如推行日语教育等。

（二）内外形势与台湾抗日运动的再兴起

不管日寇对台湾人民采取何种政策,目的是要实现‘标准殖民地”。所以一切政策，都是为了“日本资本主义的繁荣”，绝不会顾及到台湾人民的死活。在台湾的所有日本人，在社会上都占有优越的地位，台湾人民遭受着民族的歧视，在经济、政治、教育各方面，都得不到平等的待遇。

政治方面　台湾人民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和自由。强大的警察组织统治着全体台湾人民。因为有“六三法”的存在，日寇在行政上，可以任意滥用“违警例”，这是警察的大权；凡是法律所没有的罚则，都可以藉“违警例”来执行；凡警察认为不如意，就以“违警例”加以处罚。

经济方面　　日本资本主义在台湾发展的过程中，首先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。原有的小规模的手工业和家庭工业，在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压迫之下，日趋破产。日本帝国主义者，利用封建剥削关系，来掠夺土地，进行其资本的原始积累，使广大的农民陷于极端困苦状态，甚至破产而沦落为贫苦工人。又因为日本资产阶级在强有力的政权及金融机构的保护之下，垄断了台湾全部的经济命脉，使台湾民族资产阶级丧失了发展的机会。

文化教育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普及普通教育的主要目的，是为了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，坚固其统治权，是为了培

养低级的办事人才，作为剥削台湾人民的工具。但是，由于政治上的压迫，经济上的剥削和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待遇，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不但未被消灭，反而日益增强起来；而接受近代的科学教育之后，他们感知了新的知识、新的文化、新的思想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政策和方针，采取了批评的态度。

在台湾内部这种新的客观情势之下，台湾人民的抗日运动，也就以新的形态出现了。但是，刺激台湾人民采取新的形态，开始新的抗日运动的，是国际情势的大变化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国际情势起了很大的变化：第一，诞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，它对于世界革命中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问题，影响很大，极大地激发了台湾人民的抗日情绪。第二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，中国民主革命的浪潮，也日益高涨起来。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活动的展开，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北伐的成功，在文化和社会方面，自1919年的“五四”运动开始出现的重大变化，新旧思潮的对流更替，新旧制度的决斗，新旧势力的消长，所有这些当然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台湾的民族运动。第三，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战争年代，从1925年的上海“五卅”惨案开始，演至沙基惨案、省港大罢工、国民革命军的北伐，以及后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等等，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具体表现，这对于台湾民族革命运动，也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同时，这一时期的日本革命运动的浪潮，也影响了台湾革命运动，尤其是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农民组合，给了台湾人民很多帮助。

（三）文化协会、农民组合、工会

1915年的大屠杀(西来庵事件)以后,约五六年之间,台湾人民的抗日运动，一直处于消沉状态。

直至 1919～1920 年之间，受了国内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，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，组织了“启蒙会”和“新民会”，仿效当时国内的《新青年》，出版《台湾青年》，开始了台湾人民的启蒙运动。同时以东京的留学生为中心，组织了台湾青年会。这些学生又利用放假的时间，组织巡回讲演团，在台湾各地批评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政策，唤起台湾人民的抗日情绪，引起了日本统治者极大的恐慌。

1921 年，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，组织起了台湾文化协会，有计划地推动启蒙运动，这是最初的全岛规模的台人抗日运动组织。不过这个协会，初期也只限于知识分子，还没有工人、农民参加，但对于工人、农民的影响是很大的，台湾文化协会对初期台湾民族运动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。

由于台湾文化协会的启蒙运动，台湾的工人和农民，也开始组织起来。台湾农民的第一个组织是 1925 年初成立的“蔗农组合”，这个团体是为了反抗制糖公司对台湾蔗农的残酷剥削、维护蔗农的利益而组织的。最初因原料问题引起蔗农与公司间的斗争，本来是一种经济斗争，但因政府出动警察队加以镇压，遂由经济斗争发展成政治斗争。由于蔗农斗志的坚强，警察亦束手无策，结果各制糖公司也不得不向蔗农让步。

蔗农斗争的初步胜利，刺激了全岛的农民，于是一般佃户也开始组织起来，各地成立了农民组合，向地主展开斗争，他们的目标是：确保佃农的耕作权；反对地主的残酷剥削，要求减租减息；反对日本制糖公司及拓殖公司对台湾农民的无理剥削和奴役。后来蔗农组合与各地的农民组合合并，成立一个统一的台湾农民组合，成了台湾农民的唯一的坚强的联合组织。从此以后，为了竹林问题、芭蕉问题、原料问题、租谷问题，先后展开了数十次的激烈的斗争。从此以后，台湾的农民运动就不是单纯的抗日运

动和经济斗争，已包含着许多具有阶级性的政治斗争的成分。

台湾的工人运动也在 1925 年，有组织地展开起来。工人运动的中心是工会。它们已经采取了近代工会的形态，以保障工人权利，改善劳动条件，发展工人福利事业为主要宗旨。为实现这些目的，他们曾先后发动了无数次的罢工。如高雄士敏土公司、基隆码头、台北印刷厂的几次大罢工，使台湾统治者惊惶万状，而大声疾呼说共产党已在台湾扩张势力了。自 1925 年初至 1927 年末，仅在这三年之间，台湾各地成立了数十个大小工会，但互相没有密切的联系，因此各次罢工斗争，都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。于是在 1928 年初，开展了工会的大联合运动。可惜，由于台湾文化协会左右派的分裂，致使台湾的工会，也形成了左右两派，成立了左派的台湾总工会和右派的台湾工友总联盟两个团体。

（四）台湾民众党、台湾自治联盟、台湾共产党

如上面所说，台湾文化协会，初期不过是文化思想的启蒙运动，同时也是台湾各阶层人民的统一战线，虽然主要的领导者多属上层知识分子，但会员包括开明资本家、地主和一般工商业家，后来也有不少工人、农民参加。

但是，由于初期共产主义者的活动，使这个团体逐渐表现出左派倾向。在这时期，上海、东京及台湾各地都有社会科学研究会、学术研究会、读书会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活动，这些团体的成员，大多数同时也是文化协会的会员，他们在该会中占有绝对之优势。以后文化协会分裂，一些人另组台湾民众党。以后又再告分裂，大地主及资产阶级于 1930 年 8 月 17 日另组台湾自治联盟，其政纲较台湾民众党为单纯，仅限于地方自治的改革。

台湾共产党于 1928 年春在上海成立。从莫斯科回来的共产党

员林木顺、谢雪红等到上海之后，召集上海（翁泽生等）、台湾（蔡孝乾、林日高等）、东京（陈来旺等）的共产主义者，在日共领袖渡边政之辅、德田球一等及中共、韩共许多领袖参加之下，以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名义成立台湾共产党。

该党控制了台湾农民组合、台湾各种工会、台湾文化协会、反帝同盟、赤色救援会，甚至影响到台湾民众党，展开了各种各样的经济、文化或政治斗争，形成了 1928 年至 1931 年台湾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时期。

当然，日本当局对于台共及台共控制下的农民组合、工会等各团体的活动，是不会放过的。1929 年 2 月 12 日，对农民组合的干部及活动分子，一次逮捕数百名，破坏了各地的农民组织； 1931 年 3 月起，开始镇压台共，逮捕了 800 多人，搜捕先后持续了两年多，反帝同盟盟员及赤色救援会会员，共被逮捕 2000 多人，继而就是台湾文化协会及台湾农民组合被迫解散。

这样，台共领导下的台湾民族革命运动，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大的警察力量镇压下去。从此，经过“九一八”事变、中日战争、太平洋战争，直至日本投降为止，台湾人民都过着台湾有史以来最黑暗、最痛苦的生活。

（五）雾 社 事 件

台湾的民族革命运动，大体上都在占台湾人口最大部分的汉族中进行。作为少数民族的高山族，表面上虽然没有任何组织，也没有任何政党政团向高山族推行宣传教育工作，但是我们应该知道，大部分的高山族是与汉民族杂居，或经常接触的，因此汉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对高山族的影响是很大的，他们的文化水准也在日渐提高，他们也开始了解反抗日本的暴力统治的方法。这种进

步的高山族的抗日思想，也逐渐传至深山中的高山族中间，终于在1930年发生了震动日本朝野的雾社事件。这次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：

是年10月27日,雾社地区举行秋季运动大会,自22日起开始准备会场。高山族一向是很耐劳役，而工钱又低廉，但是日人却蔑视他们，所以他们平素就对日人怀了反抗心。这次举行运动会，日人便雇了高山族十余人，搬运木材。此时因下雨，道路泥泞，工作进展迟缓，监工的日人警察石川和吉村二人，就执鞭痛打，其中一人不服，反唇叱骂，日人愈怒，便更加毒打，至夜半此人因伤致死，全山高山族旧恨新仇并发。时有两名高山族人，日名叫做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，均受过中等教育（一人毕业于师范学校，一人毕业于农业学校），担任小学教员，是高山族的知识分子。且他们的妻室美丽，曾为日警图奸未遂，怀恨未报。于是高山族社众乃推花冈兄弟及头目莫那鲁道为首，筹谋决定于运动会那日发动暴动。

27日晨,如期举行运动会,日人来宾及学生家长都来参观,正在兴高采烈之时，高山族社众早已埋伏会场周围，约近午刻时候，他们先将儿童逐一抽走，花冈兄弟脱了教员制服，换上高山族服，角声一鸣,高山族众500余人挺身而起，刀光闪闪，人头落地，把在场的日人尽皆杀死，同时围攻警察派出所、邮局、日人公司、日人官员宿舍等，共杀了134人，受伤半死者215人。他们占领雾社三天，获取武器弹药，退入深山。日人遂遣大兵，实行围剿，但在深山森林里面，已无用武之地。于是日人不顾人道，违反国际条约，使用飞机投下毒瓦斯，再加兵马，接战月余，尚未有显著战果。后来用了招降政策，但高山族的同胞始终拒绝日寇的诱降。至11月19日，在马赫坡社第一岩窟附近，发现了高山族人缢尸19具，20日在第二岩窟附近森林中，又发现了妇女儿童140人自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